

戰後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回顧與展望

李仲民*

從小川尚義繪製〈臺灣言語分布圖〉到今年剛好滿百年，這百年來臺灣地理語言學能從戰後時期的消沉，而至今日的蓬勃發展，歷經了許多前人的努力。不只在語料上、研究成果上的累積，另外在語言調查、研究方法上經驗傳承與不斷地技術修正，才得以有今日臺灣地理語言學走向細緻化、跨學門化以及資訊化，獨具特色的發展方向，以及豐碩的研究成果。

本文將針對戰後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做整體的回顧與展望。回顧的目的，除了張顯前輩學者的成就，更在於記錄前輩學者的辛勤努力，以作為後學者效法的榜樣。展望的目的，在於知現今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特色以及不足之處，以作為後學者砥礪努力的目標。

依照本文的討論重點，以下茲分五小節論述之：

- 1.前言
- 2.地理語言學
- 3.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回顧
- 4.現今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局限與展望
- 5.結論

關鍵詞：地理語言學、方言學、閩南語、語言調查、語言地圖

1. 前言

綜觀戰後臺灣閩南語的研究，雖然深受由大陸來臺學者的影響。然而由於學術傳承與研究目的的不同，使臺灣閩南語的研究擁有自己的獨特性，因此今日臺灣的閩南語的研究發展與大陸並不相同。大體而言，大陸的閩南語研究立足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之下，因此比較重視各方言的記錄，並且強調與漢語的關聯性，主要目的在於為歷

* 李仲民，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研究生；逢甲大學、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服務；另外大陸的閩南語研究調查的地區大多只到縣級，並且往往以「城關」音為標準，因此大多只能呈現巨觀而概略的觀察結果，方言間微觀的差異性則無法顧及。

反觀臺灣閩南語的研究，相對於大陸的研究而言，則更多樣化、更細緻化，無論在傳統方言學基礎上所做的單點深入調查，或在成面、成片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都有出色的成績。另外在所調查的方言區域上，不僅到鄉、鎮級，甚至已達到村里級以下，乃至家戶的密度。近年來在地理語言學的調查研究的技術層面上，更結合了地理資訊系統、GPS、空照地圖等科技；與電腦科技的結合，使得在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朝向更科學、更精確、更詳實的發展。另外在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上，對於臺灣社會方言的調查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就地理語言學來說，研究臺灣語言地理的開山始祖，首推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1907）卷首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圖一）**，圖中詳細繪出漳、泉、客各方言在臺灣的分布情形，此圖究竟依據什麼資料繪製而成，現在已無法得知，或許是經由粗略調查並參考籍貫分布圖所製成¹。拿此圖與今日對臺灣調查的研究成果來比較，仍多相符，可見此圖展現出當時臺灣語言的分布實況，可信度是相當高的。時至今日，當我們在進行臺灣的語言地理調查時，仍多以此圖作為參考依據，或做方言消長的對比依據，它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從小川尚義繪製〈臺灣言語分布圖〉到今年剛好滿百年，這百年來臺灣地理語言學能從戰後時期的消沉，而至今日的蓬勃發展，歷經了許多前人的努力。不只在語料上、研究成果上的累積，另外在語言調查、研究方法上經驗傳承與不斷地技術修正，才得以有今日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獨特風格，以及豐碩的研究成果。

本文將針對戰後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做整體的回顧與展望。回顧的目的，除了張顯前輩學者的成就，更在於記錄前輩學者的辛勤努力，以作為後學者效法的榜樣。展望的目的，在於了解現今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特色以及不足之處，以作為後學者砥礪努力的目標。

2. 地理語言學

方言學依其研究目地與方法的不同，洪惟仁先生（2003）將其分為：傳統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三個範疇。雖然分為三科，但三者之間不是互相排斥，而是

** 編按：本文所附圖片，請見本刊附錄：【語言地圖】。

¹ 參見洪惟仁。（1992.2），p31。



相互補充的。分爲三科的主要原因，在於三者研究的著眼點不相同、研究方法不同；展示成果的方式也不相同。傳統方言學研究目的在詳細而完整的呈現一個方言的形式內容與結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目的在把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佈展示成語言地圖，進行方言分區並對此語言分佈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社會語言學研究目的則在於把方言變體在社會階層的分佈以數據的方式展示成圖或表。另外三者之間又具有階層性的依賴關係：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在進行調查研究之前必須對這個語言的結構有完整而詳細的掌握，因而傳統方言學可以說是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基礎。

地理語言學在臺灣並不是一個新興而令人陌生的學科，從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學者也不在少數。然而當我們翻閱這些資料，我們卻可以發現許多資料往往對地理語言學的定義模糊不清；更有些人以爲，只要在方言研究上附上方言地圖，便屬於地理語言學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有必要先對地理語言學下一個定義。

賀登崧（2003）認爲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

1) 慎重遴選少量語音、詞彙以及語言片斷，到較多的地點進行調查，記錄下其發音。

2) 每個調查項目制作成一張地圖。這時，對語言資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實際記錄到的形式表示出來。

3) 把詞及其所指對象聯繫起來，也就是要研究詞彙中所反映出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文化現象。

4) 對地圖進行解釋。對於語言學者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工作，這是要以上述三項工作為前提的。語言地圖的作用是為語言（方言）間作比較、為語言演變的歷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們能夠確定語言和文化的地理界線，也能夠進而研究語言和文化相互影響的問題。

曹志耘（2006）爲地理語言學所下的定義：

地理語言學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爲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佈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佈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的機制。

若我們利用 Chomsky (1964) 語法研究的「三層次妥當性」(three levels of adequacy) 理論來省視前面所學的地理語言學的定義：合理且正確地進行語言調查並記錄，這是達到了「觀察的妥當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來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佈狀況，這可以說是達到了「描寫的妥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佈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的機制，才可以說是達到了「解釋的妥當性」(explanatory adequacy)。所以地理語言學決不是止於語言地圖的繪製，更重



要的是要能解釋，爲什麼會這樣分佈、爲什麼會有這些變異以及語言變化過程的機制是什麼。要確實掌握的是，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主體是「語言」，而不是「地理」。如果本末倒置，那就不是語言學研究的範疇，而是地理學的研究了。

2-1. 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分野

那麼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分野又在那呢？我們可先從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名稱討論起。曹志耘（2006）曾對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等相關術語的使用頻率做了以下的統計²：

排序	英文術語	出現次數	中文術語	出現次數
1	linguistic geography (語言地理學)	18800	方言學	2470
2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地理語言學)	8100	語言地理學	169
3	dialect geography (方言地理學)	46600	方言地理學	47
4	dialectology (方言學)	29100	地理語言學	45
5	areal linguistics (地域語言學)	6050	地域語言學	2
6	geolinguistics (地緣語言學)	1470	地緣語言學	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西方語言學上多用“linguistic geography”這個術語，而在中國則多用「方言學」，所以在中國這二術語往往互相混用，然而這二者的意涵並不完全相同。這個意涵的不同，是在於中國以「方言」來對譯英語的“dialect”並因此以「方言學」來對譯“dialectology”所造成。所以我們必需先釐清 dialect 這個字的涵義，才能區別與 linguistics geography 的不同。

dialect 在中文裡頭，都是與「方言」對譯，然而 dialect 是由 dia-與-lect 二個字根所組成。-lect 是語言的意思，無需多加討論，重點在 dia-這個字首。dia 起源於希臘文介系詞與副詞 dia，本義爲 through, between, across(穿越、之間、之中)的意思，另外 dialect 延伸出 dialectical (辨証的)的字義。所以 dialect 這個字，應該沒有地理上的意涵。所

² 曹志耘是利用 Google 在網路上搜索有關術語的出現次數，但爲了避免混入日語材料，所以搜尋範圍限制在簡體中文網頁。所以我們並無法確實知道這統計資料中是否包含了臺灣部份，或者是臺灣部份佔了多少比例，因此並無法展現臺灣地區實際使用的情形。然而由於目前二岸三地的學者交流頻繁，所以筆者認爲這是華人學者一般的認知或使用情形，因此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以也許用「語言變體」這個詞，更能清楚表達出 dialect 這個字的含意。

然而近代歐洲語言學家對「語言變體」的認識，首先是來自於地理上的，所以 dialect 在當時，是可以與中文的「方言」對譯的。但是我們都知道，dialect 可以再區分為 regional dialect（地域（地理）方言）和 social dialect（社會方言）二大類。所謂 regional dialect 是指「語言在不同地域的變體」；而 social dialect 是指「語言在社會的變體」，所以由此可見，dialect 絕不是專指地理上的，而是指一種語言「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

反觀中文「方言」這個字，「方」有方位、處所、邦國、地方之意，所以「方言」這個詞本身是有地域（地理）含意的。因此中文「方言」這個詞就是指「各地域所擁有各俱特色的語言」，也可以這樣說，「方言」就等於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地理語言」。可見「方言」這詞的使用範圍是比 dialect 狹隘的，「方言」的詞義只能指稱 dialect 裡的 regional dialect 這範疇而已。今日關於「方言學」研究的內容，有二種不同的旨趣：一是指研究各種口音和方言在空間（地域和社會）、時間上分佈的語言分支學科³，所以可以再分為方言學（傳統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三個研究範疇；另一種則是只做單一地點的研究，注重語言地域變體，並以研究此地域變體的形式內容及其內部結構的學科。為了區分二者的不同，我們往往在指稱後者的方言學時，稱其為「傳統方言學」⁴。

2-2. 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

與「地理語言學」這個名稱相近並且還混用的，還有一個名詞叫做「語言地理學」（方言地理學）。「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其實是二個截然不同的學科，「地理語言學」是屬於語言學的範疇；而「語言地理學」則是屬於地理學的範疇。

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在語言，簡而言之就是根據詞的地理分佈，來探索詞的歷史變化過程的一門學科⁵。而在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上，則是對一種語言（方言）在地理上分佈的區域劃出分界線，並對此語言（方言）為什麼如此分佈、它歷史上的消長為何？提出合理的解釋。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重點在地理，將語言現象當作社會群體現象來思索，因此只涉及外在語言學的表面地帶，即方言，並視其為全部，以便考察這些地區的社會和空間環

³ 見 R.L.特拉斯克編（2000）《語音學和音系學詞典》，《語音學和音系學詞典》編譯組譯，北京語文出版社。p81，「方言學」詞條。

⁴ 見洪惟仁（2004）p31。

⁵ 真田信治（2002）p89。



境⁶。也就是以語言的分佈或特徵，來解釋地理現象，如種族、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屬於人文地理的範疇。

雖然英文中也有 *linguistic geography* 與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二個詞，而中文以「語言地理學」和「地理語言學」來對稱。若就從上節曹志耘（2006）的統計來看，*linguistic geography* 一詞使用的次數還遠高於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一詞的使用。但由於曹志耘做這個統計時並未區分年代，所以並無法知道這個用語是否有隨著時代不同而改變。因為至少我們知道像 *geolinguistics* 這個詞，是較為新興的，而現今的多為地理語言學界所採用，例如日本的國語研究所於 2007 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世界の言語地理學」，英文譯名便是為：「*Geo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

雖然 *linguistic geography* 中文一般都譯為「語言地理學」，但事實上也可以譯為「語言地理」而不是指一門學科。若將 *linguistic geography* 譯為「語言地理」，則是指研究的內容和研究目標；而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譯為「地理語言學」則是指研究「語言地理」的學科。一個指研究的內容，另一個是指這門學科，二者不互相衝突。而 *geolinguistics* 則是非常明確地是為了「地理語言學」所創立的專有名詞，*geolinguistics* 這個詞的構詞法，一如 *sociolinguistics*（社會語言學）這個專有名詞的構詞法。美國社會語言學在 1950 年代剛開始產生時一般是稱為“*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語言社會學），直到 1960 年代後 *sociolinguistics* 一詞才開始出現的。時至今日更是明確的將「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視為不同學科。所以由「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這個字的英文構詞概念，反過來看 *geolinguistics* 這個字的英文構詞，為什麼它是拼寫成“*geo-linguistics*”而不是拼寫成“*lin-geography*”或“*dia-geography*”，它強調是「語言學」而不是「地理學」的概念是顯而易見的。

3. 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回顧

在前文中，我們已對地理語言學的內涵下了定義，本節我們將依調查研究的區域大小，分為宏觀、中觀以及微觀⁷三個範疇，來分別回顧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要特別說明的是，其中有部份研究，只是附有語言地圖而非以語言地理作為研究目的，並未符合我們對地理語言學所下的定義，但由於這些語言地圖有其時代意義，所

⁶ 羅朗布洛東（Roland Breton）（1995.2000）p1。

⁷ 本文宏觀、中觀以及微觀的分別標準，主要是依行政區層級來分別，「宏觀」主要是指以全臺為調查研究對象；「中觀」主要是指以縣級（包含跨縣）為調查研究對象；「微觀」主要是指鄉鎮市級以下為調查研究對象。



以本文仍將其列入。

3-1. 宏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全域）

宏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在戰後臺灣的語言地理上成果是豐碩的，從初期至現在都有不少的學者從事研究的工作。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說，宏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是臺灣戰後語言地理研究的指標性研究。由於宏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開展，才促使中觀、微觀的研究爲了追尋更細緻、更準確的研究目標而蓬勃發展。

吳守禮（1954）《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圖二）⁸

吳守禮先生的「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自述是轉載日本明治四十年《日臺大辭典附錄》，所以此圖即是小川尙義在《日臺大辭典》（1907）卷首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不同的是，小川尙義的原圖是彩色圖，是以不同色塊區分不同語言和方言。而吳守禮先生的「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則爲了配合黑白印刷，所以改以網格區分不同語言和方言。

鍾露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圖三）

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鍾露昇利用在師大、輔大任教的三年期間，對此二校學生進行的語言調查，並於1967年撰成《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的研究報告。這些學生年齡約18至31歲不等，大部份是19至26歲之間，共調查人數448人，174個調查點，問卷字表的語彙僅27個。依照此資料，論文中列出語音種類、分詞、分區統計各種口音的使用人數及百分比，並分詞繪製出「各縣市代表語音」、「各地區代表語音」的二種方言地圖。這是臺灣地區真正透過語言調查，而繪製語言分佈地圖的發端，也是臺灣的第一幅方言特徵圖。但由於調查點分佈不均，故無法劃出明顯的等語線，舉例來說，在鍾氏的地圖上，北臺灣地區（臺北縣、市、及基隆市）除基隆市（以行政區隔開）外，都劃歸泉音區，這與實際狀況是完全不相符的。

整體說來，鍾露昇的地理語言學的觀念是進步的，例如他說（1967.p10）：

⁸ 由於在期刊印行前，不及取得吳守禮、鍾露昇與顧百里三位先生的著作權同意，因此原來在會議本中的附圖二、附圖三與附圖八，在本文只能暫缺。另外對於丁邦新、鄭錦全、洪惟仁、卜溫仁、張屏生、潘科元、張素蓉和簡秀梅諸位先生，慷慨應允無償提供他們的語言地圖，則在此表示感謝。



「在臺灣省內漳泉雜居，又因交通方便，時常遷徙，因此各地方言很難截然劃分區域性。以縣市為單位，顯然不夠；因此我們以區、鄉、鎮為調查點，可以作得精細些。」

又如 (p12)：

「臺灣的閩南語分佈，有些語詞很難截然分區域，採用點制畫法，可以作的更精細。」

這種注重調查點數量要多、以鄉、鎮為調查點的調查，正是地理語言學調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在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之後，能再次重視調查點數量要多、以鄉、鎮為調查點的調查，是要等到二十年之後，洪惟仁先生的調查研究了。

不過在當時仍是以傳統方言學為主流的時代，鍾露昇不能免俗的也提出所謂的「代表性語音」。

「各區、鄉、鎮為一調查點，選出代表語音。同一地區內部有不同的，以多數為代表。」

甚至連各縣市也以統計使用人數的多寡，選出各縣市的代表音。就今日的研究觀點來看，掩蓋了各鄉鎮區的差異，反而更無法精準地繪製出各個方言區。

不過無論如何，鍾露昇首開在臺灣以地理語言學的觀點來進行調查研究，此學術成果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洪惟仁先生讚譽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實在是台灣漢語地裡語言學的開山之作⁹。

丁邦新 (1980) 《臺灣語言源流》----「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圖四)

在丁邦新的《臺灣語言源流》一書的第七頁中，附有一張「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此圖據書中所述，是根據手邊的材料，就其大者而言，約略繪成，作為參考。並說參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氏族篇及語言篇，1960，及臺灣各縣市志稿人民志，人口篇或語言篇等。

這張語言地圖主要是以縣為單位，僅分出 1.泉音盛於漳音；2.漳音盛於泉音；3.泉音與漳音相當，這三種情況。就其所繪製的語言地圖來看，準確性不高，更別說細部的區別了。尤其以人民的籍貫為依據，來判別語言的不同，並以此認定是通行泉音或漳音，更是失了準確性。但這應該是受到所參考的資料限制，並非丁邦新先生的不嚴謹所造成。與小川尚義的語言地圖相比較，此圖在準確度、細緻度和美觀上都大大不如。但丁邦新的《臺灣語言源流》此書在當時，是臺灣語言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本專書。

⁹ 洪惟仁在其博士論文(2003.6)本文前〈感謝的話〉中提到：「鍾老師(鍾露昇)的《閩南話在臺灣的分佈》(1967)是台灣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也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對我後來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有深刻的影響。」



洪惟仁：「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圖五)

洪惟仁以十餘年的時間，對臺灣進行方言調查，為現今對臺灣全島漢語方言進行調查研究最久且最投入的一人，於 1989 至 1997 年間在中央研究院龔煌城院士的主持下，陸續撰成臺灣北、中北、中、南（高雄部份）、南、東（含屏東和澎湖）等六冊調查報告。並繪製〈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1990，2002，2003 修訂），此圖是現今唯一能與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相媲美的臺灣全島漢語方言地圖。更令人敬佩的是，洪惟仁先生對語言調查的執著，雖然已年過六十，仍然熱衷於語言調查的工作，並將最新調查的結果對此圖進行修正，所以此圖從 1990 年初繪，至今（2008）已經歷至少五次以上的修訂。此圖對臺灣現今漢語方言的地理分佈，忠實地呈現出了概況。相較於之前的鍾露昇所繪製的方言地圖，已大大地進步。

卜溫仁《臺灣語言學圖集》（《Mapping Taiwanese》（2009））(圖六)

這是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卜溫仁，自 1993 年至 1999 年期間所執行的國科會計畫。所用的字表都是選用一些常用詞彙，並經過六次修訂，分成 13 類共計有 325 個詞項。由於卜溫仁的記音採用嚴式音標的印象式記音（impressive transcription）方式，聽到什麼記什麼，他把所記的音值直接展示在地圖上，所以地圖上所顯示的變體很複雜，難以繪出同語線。卜溫仁《臺灣語言學圖集》最大的特色：一是它是有史以來臺灣漢語方言調查人數最多的一人，二是第一個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繪製臺灣語言地圖的人。另外卜溫仁的語言地圖是採用「方言特徵圖」，這在以全臺灣為區域的語言地圖中，是較為少見的。

張屏生（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圖七)

張屏生是繼洪惟仁先生之後，致力於臺灣閩南語、客語調查研究，最出色的學者之一¹⁰。張屏生所從事的方言研究，最主要的是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研究，尋找出臺灣地區各角落特殊的變體；所以在發掘臺灣閩南語的各種不同類型上，功不可沒。

在張屏生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一書中的第一冊，書末附有一張「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的彩色語言地圖。若說此圖是張屏生這些年來對臺灣閩、客語調查研究的總結，並不為過。雖然張屏生調查研究的工作是從傳統方言學的角度切入，但經過長期語言資料的累積，由點而成面，因此能提出臺灣閩、客語分區的條件。故將臺灣閩南語細分為九片（偏泉片、泉州腔新竹小片、泉州腔鹿港小片、安溪片、同

¹⁰ 若以近年來臺灣的方言調查的質與量來說，張屏生教授堪稱臺灣少壯學者的第一人。



安片、惠安片、新泉州片、偏漳片、漳泉混合片（通行腔）¹¹），就臺灣閩南語類型的區分上，是較洪惟仁先生的區分更為精細。另外此圖與洪惟仁先生的地圖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此圖行政區域均有標示出來（到鄉鎮市級），所以只要觀覽此圖，對於各方言的分布地點便可以輕易掌握，很適合初接觸臺灣閩南語研究的學生或是非專業人使用。

由於此圖的重點在臺灣全域，最細密處僅達鄉鎮級，所以較難突顯鄉鎮級以下不同方言的分佈，這是此圖未臻完善之處。

3-2、中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縣級）

中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概略是指以縣為範圍的調查研究。雖然現今臺灣各縣在編寫縣志時大多會有語言志這一章，但大多還是採用傳統方言學的觀點，而非以地理語言學的觀點寫成。所以此類的研究，仍以學位論文為主：

3-2-1. 以縣為單位

顧百里（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圖八）

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在澎湖閩南話的研究，以及臺灣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是相當重要的一本學術論文。在澎湖縣閩南話的分佈和特點上，他認為：¹²

所調查的八十八種澎湖方言實在可以說是大同小異，各地的語音系統都非常類似。在本調、聲母和絕大部份的詞彙上，各種方言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為了方言比較的目的，我們在本章裡自然會強調各種方言的不同之處；但我們不能忽視這八十八種方言的基本一體性。

又說：

本文中所描寫的各種方言相差最大的地方是在變調、韻母和一小部分的詞彙上。

所以顧百里選擇了八個條件，來作為澎湖方言分類的依據：

1. 上聲之變調。
2. 陰去聲之變調。
3. 帶喉塞音韻尾陰入聲之變調。

¹¹ 這個分類標準，請參見張屏生（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第十章〈台灣地區的漢語方言分布〉p386-393。

¹² 見顧百里 1978，p111。



4. 「好、廟、落、藥」等字之韻母。
5. 「雨、布、路、虎、姑」等字之韻母。
6. 「汝、瓦、銀」等字之韻母。
7. 「洗、狹、(找)、月」等字之韻母。
8. 特字和詞彙。

依此標準，繪製了十二幅方言地圖，其中第一幅至第十一幅為單一特徵項的「方言特徵圖」，第十二幅則為「澎湖方言綜合地圖」（方言區劃圖）。並將澎湖閩南話劃分為二個大方言區，第一區的涵蓋範圍，大約就是白沙鄉全境；第二區的涵蓋範圍，則為除白沙鄉以外的其他地區。其中第一區不再劃分次區，而第二區則還細分為五個次區。將澎湖閩南話劃分為二個大方言區，顧百里所依據的標準，事實上就是「偏漳腔」與「偏泉腔」之別。

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是臺灣第一部專門以地理語言學為研究目的的學位論文，所以本書的價值不言可喻，但是本書有一個重大缺點，就是未對發音人的年齡當做抽樣變因進行控制。顧百里所選擇的發音人，小至國中、小學生（約 12、13 歲），老至約 60 歲，並未顧及年齡差異對語言變化的影響。以此作為一個村的代表，這將會產生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使人對於所做的方言比較結果產生質疑。

但是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是臺灣地區第一部以地理語言學為研究目的的學位論文，所以在臺灣地理學的研究上，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潘科元（1997）《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圖九）

潘科元的《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是他在清華大學語言所的碩士論文。此論文是繼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之後，另一部出色的地理語言學的學位論文。作者利用大台北地區 28 個方言點的方言資料，進行了類型比較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與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相比較，雖然調查點跟調查人數較少。但在發音人的選擇上則控制在以世居當地，本人在當地成長營生，不常待在外地，60 歲以上，以閩南語為生活語言的老年人為對象。範疇化的控制，使得在進行方言比較時更具可靠性與精確性。

文中他所用來比較的閩南語類型變項計有：聲母 1 類；韻母 26 類；聲調 5 類，這些變項都是臺灣閩南語各次方言間最顯著的差異性類型特徵。根據所分析的變體類型及方言調查結果，將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為泉州腔、漳州腔、漳泉混合腔三種；泉州腔之下再細分為老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等；漳州腔之下再分老漳腔、新漳腔。並根據調查資料繪製了「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老年層）」的語言地圖。此圖是



黑白描線圖並配合不同的點符號來區別不同方言，所以整體說來有失於清晰和精準，所以此圖只展現了一個方言界線和方言分佈的概略情況。

洪惟仁（2007）《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圖十）

洪惟仁先生對台北地區的方言研究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1992年所出版的《臺灣方言之旅》中，已附有一幅〈台北地區方言分布圖〉。2007的《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則可說是洪惟仁先生這些年來，對台北地區閩南語研究的一個初步成果。

文中根據方言比較的結果，歸納出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差的22個主要變項，並且列出各個變項的變體類型。再根據方言調查語料，將台北地區閩南語分成：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偏泉(安溪)腔、老漳腔、偏漳腔等七個基本類型。偏漳腔和偏泉腔是攙入太多的泉音或漳音，其他方言類型則是自然分化的結果。台北地區唯一的方言混雜的閩南語分佈區是烏來鄉，若把這個「混合腔」算進來，台北地區共有八個方言類型。

另外文中對大台北地區的閩南語分布提出六大觀點：

1) 從整個台灣北部來看，老漳區的分佈區東北片由台北縣東海岸的三芝、石門、金山、基隆、九分、金瓜石、貢寮、雙溪一直向南連接到宜蘭縣；由金山越七星山向南延展到基隆河岸的士林、內湖；西片老漳腔在台北縣西南邊越過龜山嶺的桃園台地北半部(蘆竹鄉除外)，本片大部分在桃園縣內，只有鄰接桃園、八德兩市的鶯歌西部的中湖地區是老漳腔方言深入台北縣的小塊。兩片老漳區和烏來的泰雅語區形成一個外環，把泉腔方言包在環內。

2) 整個台北盆地及盆舷地帶像一個大布袋，淡水河口譬如布袋口。布袋的外緣除了基隆河以北士林、內湖兩地的漳腔區以外，其餘的廣大地區都是泉腔方言的分佈地。布袋的底部是安溪腔區，位在布袋的頸部及口部是同安腔區，而新店溪和大漢溪的交匯處，是安溪腔和同安腔兩個方言區的交界。

3) 台北泉腔布袋的中心卻又包著一個板橋中和區的漳腔方言片，形成了一個漳腔方言島。整個台灣北部地區形成了漳包泉，泉包漳的地理形勢。

4) 漳泉交界地帶的板橋和大稻埕附近是清代分類械鬥最嚴重的地帶，同時也是方言接觸的「前線」，方言融合的「爐心」。東北海岸的老漳腔和泉腔方言有大屯山、中央山脈、基隆河等自然疆界阻隔，老漳腔區成了偏遠地區，不容易受到泉腔的影響，因而比較能夠保存老漳腔的特色，但士林和板橋就沒有那麼單純，都接受了不少的泉腔特色。接近士林、大直的大稻埕、大龍峒同安腔，也受到漳州腔的影響，相對的士林漳州



腔也相當的泉腔化，但漳泉分別還是很明顯，老派還保存相當多的特色。漳泉方言融合最嚴重的是第二個爐心大漢溪下流。以大漢溪為界，西岸的樹林、新庄屬於「偏泉腔」，東岸的板橋、中和、土城的漳腔方言四面被泉腔方言團團圍住，不能不受泉腔影響而變成「偏漳腔」。

5) 安溪腔分佈在台北盆地南半部和其南麓山區。距離「爐心」越遠的地方就越能保存原鄉的方音。「老安溪腔」分佈在台北盆地的南麓地帶，因為遠離了「爐心」，才能保存老安溪腔；距離「爐心」越近的地方越可能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接受其他方言的成分，或者受到牽引而及早發生自然演變，這些地方就變成「新安溪腔」了。更有進者，以安溪腔為底層的樹林、新莊因為雜居了一些漳州人，影響之下，混雜了更多的漳州腔成分，因而變成了「偏泉腔」。

6) 同樣的，老同安腔分佈在偏僻的淡水河口，遠離了「爐心」，因而能夠保存同安腔的央元音特色，越往上游，越接近「爐心」的三重、大稻埕都喪失了央元音而變成「新同安腔」了。同為「新同安腔」，最接近大稻埕「爐心」的地方，如大稻埕受到漳腔的影響最大。只有有自然疆界保護的同安腔方言才能減少被融合的速度，永和和社仔島就是例子。永和雖然和中和的漳州腔區交接，可是其東、北、西三面都被新店溪所包圍著，在福和橋開通以前是一個交通不便的閉塞地帶，因而奇蹟似地保存了老同安腔的特色；還有社仔是一個封閉的洲島，在百齡橋開通以前，也是一個閉塞的地方，因而在新同安腔方言中保存最多的同安腔特色。

本文末附有26張語言地圖（1張臺灣語言方言分布圖、24張台北地區變體、1張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均為彩色圖），較潘科元的地圖更為細緻，不僅有標示出各鄉、鎮、市的行政界線，在方言界線上則是細緻到村、里。是現今所見最詳實的臺北地區的分言分佈圖。

3-2-2. 以方言分佈為對象

以方言分布為調查研究的對象，是指一單一方言片為調查研究對象，方言分布範圍不一定會與行政區域的劃分相符，往往是跨行政區域的。調查研究的重點在於展現此方言片對內的差異性與對外的一致性，所以與以行政區為調查研究單位，主要在分別有幾種方言類型和劃分此區各方言類型的方言界線的研究目的並不相同。這種單一方言片的調查研究，對此方言片的方言特徵、內部差異、分布區域以及使用狀況，能有更深入、更詳細的瞭解。但此類的調查研究目前在臺灣極少，本文要介紹的是洪惟仁（2004）〈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與筆者撰寫中的《語言在時空的變異與變化——以臺灣東北部偏



漳腔閩南語為例》。

洪惟仁 (2004) 〈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¹³ (圖十一)

本文在討論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做一個詳細的描述¹⁴，並繪製語言分佈圖。另外並從語言社會學及語言地理學的觀點，對語言分布的事實進行解釋。文末附有六張此地區的語言分佈圖 (彩色圖)¹⁵。

由於片狀的語言地圖幾乎是不可避免地以偏概全，以強代弱的現象。語言調查者不可能進行全民普查，因此所繪製的片狀分佈圖，自然會以點概面。但洪惟仁 (2004) 將調查點精細到村里以下，這是此文進步的地方。經由洪惟仁先生對此地區進行語言調查之後，再與小川尙義 (1907) 以來的語言地圖相較，得到以下的差異：

1) 在小川尙義 (1907) 的〈臺灣語言分布圖〉中，所有的客語區都緊臨南島語區，但我們的地圖兩者之間是一條長條連續的閩南語區，這個地區主要是平埔族的分佈區。……我們無法想像現在講閩南語的平埔族在日治時代是講客語的。

2) 小川尙義 (1907) 在恆春、車城還標示著相當大的客語分佈區，但是現在客家人已經閩南化，這些地區都已變成閩南語分佈區了。

3) 小川尙義 (1907) 在高屏地區還明顯地標示漳泉方言的分佈區，但現在漳泉幾乎已經完全融合，只有高雄海邊林園鄉紅毛港還保存了一點淡薄的泉腔味道。唯一可以算是泉腔方言的只有小琉球。除此之外，整個高屏地區都被我們劃入閩南語混合腔區。

4) 小川尙義、淺井惠倫 (1935) 〈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在屏東平原閩客語分佈區內有 6 個西拉亞平埔族的部落，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5) 楠梓仙溪上游 (三民鄉) 和荖濃溪上游 (桃源鄉) 小川尙義 (1907) 劃入鄒族的分佈區，小川尙義、淺井惠倫 (1935) 進一步標示其方言 (Kanakavu, Saaroa)，但在桃源鄉部分則多了幾個布農族部落。李壬癸 (2004) 也把這個地區劃入鄒語區。但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個地區布農族已經佔了 70%，顯示近百年來布農語向南鄒語分佈區擴張的趨勢。

6) 屏東三地門青葉村是個魯凱村，但前人的地圖都沒有標示。杜良君「本村居民全屬魯凱族，約一九三零年前後，在日本政府的輔導下，主要由大武村遷來，也有少部分來自佳暮、霧台及好茶。」(2003:79) 可見語言分佈的改變是移民的結果。

7) 牡丹鄉濱海旭海村是個平埔族村，在過去的地圖都被劃入排灣族的分佈區，本

¹³ 洪惟仁先生的這篇論文調查範圍來說，應該歸類於「中觀」的語言地理研究，但由於調查的層級至村級，是屬於「微觀」的調查研究，因此本文以調查研究的角度為依據，將其歸類在「微觀」的範疇。

¹⁴ 此次調查的重點在六堆客家、滇緬義胞、大陳義胞及原住民的實際分佈。

¹⁵ 此六張圖分別為：「高雄縣美濃以北地區語言分佈圖」、「屏東北部語言分佈圖」、「屏東中部語言分佈圖」、「佳冬新埤周邊地區語言分佈圖」、「恆春半島語言分佈圖」以及「高屏語言分佈全圖」。



文標示為平埔族的閩南語分佈區。

〈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一文，無論就其調查目標、調查方法以及對現象的推論解釋，都是標準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說此文是近代臺灣地理語言學的代表作，並不為過。

李仲民(2009)《語言在時空的變異與變化——以臺灣東北部偏漳州閩南語為例》(圖十二)

這是筆者正撰寫中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的主題在於以臺灣東北部的偏漳州腔為例，探討一個成片方言對內的差異性，以及對外的一致性。因此本論文研究的重點，偏重於語言在共時性的現象討論。依循上述的研究目標，在地理語言學上所要探討的內容如下：1.藉由語言地圖的繪製，來觀察臺灣東北部的偏漳州腔的實際分佈現況。此部份將再分為二部份探討，一為釐清臺灣東北部偏漳州腔的實際分佈界線；一為展現臺灣東北部的偏漳州腔內部不同類型特徵和變體(variation)的分佈情況。由此觀察「語言分佈的連續性(continuity)」。2.藉由不同年齡層的語言地圖的繪製，觀察臺灣東北部的偏漳州腔語言分佈的變化。3.藉由語言的計量分析，來證明「宜蘭腔」的語言特徵。4.利用分區(臺北縣、宜蘭縣)的各別統計，觀察二地區的各別演化。也由此觀查二地區語言變化速度的不同。5.討論GPS及GIS在語言調查、語言地圖繪製上的運用。

此論文另一大特色是語言地圖採用方言特徵圖(點圖)，而不是區塊圖。這對於觀察語言在地理上的分佈，更為詳盡。

3-3. 微觀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鄉鎮市級以下)

微觀的地理語言學是臺灣語言地理學最具特色的特徵，除了有深入研究討論的學位論文，也有小而精緻的單篇期刊論文，更有大規模的研究計劃。

李仲民(1998)《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圖十三)

《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為筆者的碩士論文，此論文為臺灣地區第一部以鄉級為調查對象的學位論文，選擇鄉級作為調查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於筆者有鑑於臺灣的方言調查工作，調查點的選擇大多不平均，有許多偏遠地區從無人從事調查研究，也因此對於語言分佈的詳情，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若有志於從事方言調查的學生，均能由自己的家鄉調查起，如此長此以往，便可累積相當可觀的鄉鎮語料，對整體的臺灣全島的漢語方言研究，將有實質的幫助。另一方面，由於雙溪鄉幅員廣大，為臺北縣第四大鄉鎮，且正位於臺灣北部泉州音與漳州音的東面交界之處，因此對雙溪鄉進行方言調查，將有助於釐清臺灣北部泉州音與漳州音的方言界線。由於是鄉級的調查研究，所以



筆者便將全鄉概分為北、中、南、東、西五個區塊進行調查。經由實地調查研究結果，繪製了十九幅方言分佈地圖。本調查研究發現並非雙溪全境均通行漳州音，在其西部盤山坑一帶已是通行泉州音，因此臺灣北部泉州音與漳州音的東面語言界線，若僅依行政區的界線來劃分，是不正確的。所以洪惟仁的〈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對此處的語言界線，也依此於 2003 年修正。

張屏生、李仲民 (2006) 《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 (圖十四)

張屏生、李仲民合著的《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發表在第六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是由張屏生負責語料調查的部份，李仲民負責以 GIS 軟體繪製語言地圖。此論文主要討論的重點在於：一、對澎湖縣白沙鄉閩南話錯綜複雜的情形，提出地理語言學上的解釋。二、對於像白沙鄉閩南話這樣錯綜複雜的語言情形，在語言分區問題上的再次檢視，這二大主軸上。文末並附有廿四張彩色的語言地圖，其中廿一張是 21 個詞項的個別分布圖（一個詞項一圖）；另外三張是綜合地圖。

由於本文是屬於微觀的語言地理的調查研究，因此在方言分區上不能以傳統的宏觀方言分區條件為依據，所以文中是就單一詞彙做討論。而這些有方言差異的詞（不同「變體」(variant)），都可以將其視為方言分區的特徵詞。並將這些特徵詞，歸納成：1. 泉、漳腔的差異。2. 白沙鄉境內的區域性特徵。3. 詞彙。等三個範疇來分別討論。最後歸結出白沙鄉的閩南話錯綜複雜的因素：

1) 白沙鄉本身居民原籍的分佈。就移民歷史而言，漢人來到白沙鄉的歷史大約只有四百年。在這短短四百年的時間中，語言雖然足以發生變化，但它的變化仍然有限。所以在方言差異的分佈上，仍難脫離居民原籍的分佈情形，這也成為影響白沙鄉閩南話的方言分佈，最大的因素。由於白沙鄉居民的來源泉州、漳州都有，所以偏泉腔與偏漳腔各自對外擴散，造成白沙鄉內部獨立的泉、漳腔競爭。

2) 受澎湖縣優勢閩南話的影響。在澎湖的最佔優勢的閩南話，是同安腔（偏泉腔）。所以在同安腔（偏泉腔）為優勢腔的澎湖縣，白沙鄉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這層外力加強了白沙鄉境內偏泉腔的競爭力（如「關官白」韻）。

3) 受臺灣的優勢閩南話的影響。近年來由於媒體、交通的發達，臺灣的優勢閩南話挾此優勢，大舉入侵澎湖群島。而臺灣的優勢閩南話是偏漳腔的混合腔，這層外力又加強了白沙鄉境內偏漳腔的競爭力。然而臺灣的通行腔雖然是屬於偏漳腔，但是不可否認的，它是一種「泉、漳濫」的混合腔。因此雖然它加強了白沙鄉境內偏漳腔的競爭力，但卻也加速破壞了原本在白沙鄉境內偏漳腔的地區特色（如「毛禪白」韻唸 uinn）。

就其價值而言，張屏生、李仲民合著的《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是臺灣地



區第一篇以微觀的地理語言學的角度，對一個鄉進行方言分區的學術論文。另外將區內所有的方言變體都分別討論、繪圖，也是臺灣地區地理語言學上的首次嚐試。

鄭錦全新竹縣新豐鄉的調查研究 (圖十五)

這是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於 2002 年開始進行的「語言典藏」計劃中的語言分佈變遷地理資訊系統。由於調查目的在於「調查居民用語變化」，所以採行挨家挨戶的訪問的方式。問卷有二部份，一為住戶資料和語用習慣的調查問卷，一為二十詞左右的調查字表。特別的是在調查的同時對此住戶進行 GPS 定位，以求得此建物的地理位置，以便將所得的資料輸入 ArcView 地理資訊軟體。其方言地圖呈現方式，是以向量化的黑白空照地圖，加上所調查的家庭的方言的紅、藍標誌，紅色代表客家話，藍色代表閩南方言，清晰且精確地呈現出閩、客二方言分佈的情形，目前完成田厝、楊屋附近約 200 多戶的調查¹⁶。此計劃所面臨的問題，根據鄭院士自己表示：其一，若遇到建戶為高樓，其內有不只一戶人家，不知如何適當表示。其二，此計劃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同時間的居民用語變化，然而此計劃必需費時四年或更久的時間才能完成，所以要達到「同時間」，極難辦到。

鄭錦全院士的計劃，在臺灣實屬空前，因為他的目的在於對全臺施行語用的普查，希望在地圖上精確地標示出每一戶人家，所以鄭院士利用 GPS、空照地圖以及 ARC VIEW 地理資訊軟體等科技設備來進行調查，以地理學的調查研究方法運用在語言學上，將語言學與地理學密切結合。雖然依賴 GPS 來定位是較符合科學的方法，但卻不一定能達到此計劃所需的精確程度，因為一般而言利用 GPS 定位，大約會有 15 公尺左右的誤差¹⁷，所以只依 GPS 所得的數據來為建物定位，事實上仍是有問題的。

張素蓉與簡秀梅的「類型指數分佈圖」(2006)

在張素蓉的碩士論文《台中縣海縣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中有附 15 張彩色的「類

¹⁶ 由於本計劃尚在進行中，所以相關資料非常零散，本論文所述內容，是由：2002 臺灣語文學會所主辦「第四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的專題演講、2004 慶祝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正式成所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會中專題演講——語言與資訊，以及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印贈的《語言典藏資料庫簡介》2004，等資料中整理而成。

¹⁷ GPS 的定位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精準，它會受到如：地球的公自轉、太陽輻射的干擾、電離層干擾、對流層干擾、多重路徑傳送誤差以及人為的誤差，因而造成誤差。其中人為的誤差影響最大，此處所指人為的誤差，主要是指美國政府為了國防安全，在 GPS 衛星訊號中加入干擾碼 (SA 選效碼)，以降低 GPS 非軍事用途的準確度。但美國政府已於 2000 年五月一日取消此干擾碼，使得 GPS 的定位誤差由 100 至 150 公尺減少到 10 至 15 公尺。參見安守中 (2004) 頁 1-12；5-12 至 5-16。



型指數分佈圖」(圖十六),在簡秀梅的碩士論文《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中則附有 6 張彩色的「類型指數分佈圖」(圖十七)。她們的研究方法都是利用社會語言學的統計方式,將所討論的音類運用統計法,計算這個音類中產生變化的比例,再轉化成數字化的指數(index),然後結合地理語言學做指數高低的分佈觀察¹⁸。這類的研究主要在觀察方言變異的「連續性」(continuity),是成漸層變異(gradation)的現象。這兩篇論文都是由洪惟仁教授指導,是漢語史上第一篇有關方言漸層分佈的地理方言學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兩人雖然都是繪製「類型指數分佈圖」,但展現方式略有不同,張素蓉是將指數標示在地圖中,並配合區塊圖來表現。而簡秀梅則是不標示指數,直接利用色階的區塊圖來呈現。這兩種方式都是想要試圖呈現出語言波傳(wave)的現象,但可惜的是效果均不是十分理想。張素蓉雖然標示出指數,但由於調查的地點不夠細密,尚有許多空缺待補上,不過已能看出語言傳播的波形¹⁹。

而簡秀梅的以色階來區分,但由於色差不大,所以波形特徵也並不顯著,以簡秀梅調查的細密度而言,卻未能將波形特徵展現出來,頗有意猶未盡之處。但在正式發表的洪惟仁、簡秀梅(2007)中,將語言地圖分別以全圖和分區圖來呈現。不但將地圖加大,而且色階清晰,同時分區圖的各個村落都加上了特徵指數(圖十八-1、圖十八-2、圖十八-3)。是一幅既能清晰展示語言漸層分布現象,又能顧及美觀的語言地圖。

3-4、語言調查方法論

語言調查是地理語言學最基本的所在,語言調查的成敗關係著整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成功與否。關於討論語言調查方法論述,鄭錦全、洪惟仁都有所討論,然而大多散見於各語言調查的論文或報告的篇章中,專門討論的文章幾乎沒有。最近一篇專門討論語言調查調查法的專文是李仲民(2004)的〈語言調查點選擇的新方法〉發表在第一屆語言、文獻與調查學術研討會上。

本篇論文主要是提出捨棄以行政區為選擇調查點的依據,改利用經緯度來選擇調查點,以求達到平均布點的目標。並且利用 GPS 來做調查點經緯度的定位,之後再與 GIS 的技術整合,來繪製語言地圖。

這篇論文所提出的語言調查方法論,打破臺灣傳統語言調查的模式,並試圖提出一種全新的選擇調查點的方法,是此論文最可貴之處。

¹⁸ 洪惟仁先生稱這種研究法為「社會方言地理學」。

¹⁹ 參見洪惟仁、張素蓉(2008)



4、現今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局限與展望

由於前輩學者的努力，再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之後，臺灣戰後的閩南語地理語言學，開創出既富有承繼性又充滿獨特性的風格。所謂「承繼性」是指承繼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陸學者的研究方法。而所謂的「獨特性」是指獨特的研究方向，以及科學的研究方法。本節將分別以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優點與缺點，分別加以檢討。

4-1 優點：

4-1-1、微觀地理語言學的發達

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相較，幅員相對小的多，同時又是屬於封閉的海島，因此為臺灣的微觀方言學的研究提供優越的環境²⁰。臺灣微觀方言學的研究，有相當大的一部份是研究所的學位論文，從顧百里（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李仲民（1998）《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林郁靜（2001）《麥寮方言的調查與研究》、梁淑玲（2001）《臺灣省彰化縣鹿港方言音韻研究》、陳淑娟（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以及張屏生在臺灣所做的語言調查等，都有相當出色的成績。尤其是張屏生的調查研究，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已經調查完畢並發表超過 30 點的深入調查。他的調查觸角，除了閩南語，也包含了客語，這是臺灣方言調查研究上的唯一一人。這些調查大多輯錄超過 2000 條以上的詞彙，為比較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記錄了寶貴的語料。

由於臺灣微觀方言學研究的發達，也促進了臺灣微觀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發達，同時也促進了臺灣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臺灣的微觀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發展，已經達到村級的層次，更有如鄭錦泉先生在新竹縣新豐鄉的調查研究，進行挨家挨戶的語言調查，並嚐試繪製語言分佈圖。這種微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是臺灣地理語言學的一大優點跟特色。

²⁰ 相較於現今中國大陸的微觀地理語言學而言，一如項夢冰（2005）p159 中所述：「漢語方言的微觀分區需要以微觀尺度布點的語言特徵分佈圖做基礎，而目前顯然還不具備這一條件」。所以臺灣的微觀地理語言學研究，是較中國大陸發達的。



4-1-2、研究的細緻化、跨學門化

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由於微觀地理語言學的發達，所以相對的在研究上也就趨向於細緻化例如卜溫仁的調查點達到超過 1000 人以上、洪惟仁先生也超過 400 人²¹、李仲民的調查也達到 200 人（100 點 200 人）。在臺灣 35,575km²的土地上有超過 1000 個調查點（比例約每平方公里 0.028 人），李仲民研究的調查密度更高達每平方公里 0.07 人（總調查面積 1424.98 km²，100 個調查點），而鄭錦全院士的調查，更試圖達到挨家挨戶的目標。所以細緻化的調查研究，是臺灣地理語言學的一大特點。

而隨著調查的細緻化，伴隨而來的就是龐大的語料處理，所以必須與資訊系統緊密結合，建立資料庫來處理。並且運用統計學來做量化的處理。另外爲了尋求解釋的妥當性，更是結合了民間文學、歷史學、地名學、宗教文化等不同學科範疇來一併研究。

4-1-3、資訊科技的整合運用（GIS 與 GPS 的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是一個整合性的系統，它以電腦爲基礎，進行空間資料的建立、存取、管理、分析、輸出及展示，並可根據不同的決策環境及目的做更廣泛的應用。簡單的說，它就是一套地圖繪製軟體，因此我們也可以將這系統運用在語言地圖的繪製上。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是利用在地球軌道中運行的人造衛星，來準確標定出自身位置的系統。現今流行的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機器有二種，一爲 Handheld GPS Receiver（手持式 GPS 衛星定位儀），此爲掌上型的定位機器，一般大約如行動電話大小，由於體積小攜帶方便，所以普遍用在登山、越野賽車等戶外活動上；另一種方式則是以 G-mouse（衛星訊號接收天線）連接筆記型電腦或 PDA 來使用，此方式普遍運用在車輛的行車導航系統上。不論是那一種機器，它都能提供地理定位資訊。

GIS 在現今的臺灣地理語言學上，從卜溫仁《臺灣語言學圖集》、至洪惟仁、鄭錦全、李仲民，已普遍運用於語言地圖的繪製上。運用 GIS 所繪製的地圖是向量圖，因此可以隨意放大或縮小而不影響準確性，所以運用 GIS 所繪製的語言地圖既可「宏觀」也可「微觀」。另外更可與空照圖相結合（如鄭錦全的新豐鄉語言分佈圖），如此更能掌握實際地貌情況。

²¹ 參見洪惟仁 2001〈台灣的漢語共時方言學的發展〉廈門 第七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另外地理資訊軟體如 ARC VIEW 它除了提供便利的繪製地圖的軟體外，也提供資料庫和統計軟體，我們只需要將調查所得的資料輸入到此軟體中，ARC VIEW 便可以自動做資料統計、製作統計圖表並繪製分佈地圖。而地理資訊軟體繪製分佈地圖所憑藉的就是經緯度（但 ARC VIEW 軟體只接受「二度分帶」座標，不過可使用電腦軟體將經緯度座標換算成「二度分帶」座標），因此 GIS 與 GPS 是可以結合運用的。在 GIS 與 GPS 的結合運用上，鄭錦全與李仲民的調查研究，已得到不錯的成績。

4-1-4. 地理語言學發展的多元化

另外在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展現多方面的研究旨趣，因此臺灣地理學的發展是多元化的，這從語言地圖上便可見端倪。無論在方言分區圖、方言變體分佈圖或是方言漸層分佈圖（「類型指數分佈圖」）上，都有非常優秀的作品。

在方言分區圖上，主要在呈現方言分佈的現況，臺灣學者多運用在巨觀的全臺的方言分佈上。洪惟仁：「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和張屏生（2007）「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是此類語言地圖的佳作。

方言變體分佈圖（點狀圖）能把某一個用於比較的項目，在不同的地點方言中的異同，表現在圖上。此類地圖可以說是所有語言地圖的基礎地圖，因為它可以細微地展現語言分佈的狀況，也可進一步討論語言為什麼如此分佈，建立語言傳播的理論。卜溫仁（2009）《Mapping Taiwanese》和李仲民（2009）的語言地圖便是屬於此類。

方言漸層分佈圖（「類型指數分佈圖」）主要在呈現語言的傳播方向與傳播範圍，多配合在社會方言地理學的研就上。洪惟仁與張素蓉、簡秀梅所合作繪製的方言地圖，是這類語言地圖的代表。

4-2 局限

4-2-1、漳泉分區的標準不明確

在臺灣閩南語的地理語言學上，漳州腔與泉州腔的劃分，一直是重要的課題。對於漳州腔與泉州腔各俱備何種語音特徵，我們是瞭若指掌的。然而在臺灣許多地區，「漳泉濫」的情況非常嚴重，往往同時兼俱漳州腔與泉州腔二者的語音特徵，此時要將此地區方言歸類為偏漳州腔？或是偏泉州腔？亦或是混合腔？便有其困難。



潘科元（1997：42）首創以類似計算指數（index）的方法，來計算台北同安腔各方言保存同安腔變體和吸收其他方音的指數。這種特徵指數的計量方法，對於比較各方言間的「接近率」很有幫助，但用來做為區別是偏漳州腔；或是偏泉州腔的標準，還有問題。因為潘科元並沒有進一步說明，指數多少為偏漳州腔；或是偏泉州腔，因此最後判別的標準仍在作者本身的認定。

洪惟仁先生（2004：38）則是以方言變體（variable）的觀念，整理出漳州腔與泉州腔的變項共 22 項，每一個都是能夠分別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類型的變項。並且說：「上面所舉的 22 個變項，每一項都可以成為區別方言類型的特徵，但是事實上台北地區的方言最多只有 6 種，所以只要少數的方言特徵就可以區別這 6 種方言，不一定要用到 22 個特徵。」雖然有這 22 個特徵可以作為區別漳州腔與泉州腔的標準，然而若同時兼具漳州腔與泉州腔二者的語音特徵²²，則此方言當劃歸漳州腔或是泉州腔，仍無一定的標準。所以洪惟仁再結合方言特徵指數的概念，利用計算泉音指數、漳音指數的方法，讓判別的標準更俱客觀性。

張屏生（2007：386）將臺灣地區的閩南語分成（一）偏泉區（二）偏漳區（三）漳泉混合區。並提出各區的主要特點：

（一）偏泉區的主要特點

1. 「血」唸 hui?4。
2. 陽平變調唸低平調。
3. 「青」（更）韻例字唸 i 韻。
4. 「箱」（薑）韻例字唸 iu 韻。
5. 宕開三文讀唸 ioŋ。

（二）偏漳區的主要特點：

1. 陽平變調唸中平調。
2. 「青」（更）韻例字唸 ě 韻。
3. 有 dz-母。
4. 「箱」（薑）韻例字唸 iō韻或「毛」韻部份例字唸 üi 韻。
5. 陽入調唸中促調，有的地區的喉陽入會混入陽去調中。
6. 宕開三文讀唸 iaŋ韻。

目前台灣並沒有一個地方能完全保有上述特點，前面三項是必要條件，後面三項至少要有兩項，才能算是偏漳腔。

²² 如臺北縣三芝鄉，〈禪〉韻唸 üi 韻，而「縣」字又唸[kuāi]，同時擁有最保守的漳腔與泉腔的特色，參見李仲民（2006）。



(三) 混合區的主要特點

1. 有/ə/元音，音值唸成[ə]。
2. 「箱」(薑)韻例字唸iu韻。
3. 「毛」(禪)韻部份例字唸ŋ%韻。

張屏生則是清楚的分別對偏泉腔、偏漳腔以及漳泉混合腔下定義²³，並明確地提出判別標準的「必要條件」與「次要條件」的概念。這是張屏生歸納臺灣的閩南語，所得到的結果。所以這是在一般的情形下大多適用，但卻也無法明確地判別同時兼俱漳州腔與泉州腔二者的語音特徵的方言歸屬。雖然可以設立一個「混合腔」，可是不同方言間混合的情形並不相同，若以「混合腔」概括之，則內部差異便無從分別。

由於臺灣「漳泉濫」的情形嚴重，所以雖然我們已經能清楚掌握漳州腔與泉州腔各自的語音特徵，但是事實上對於漳泉混合嚴重的方言，想要明確地指出是偏漳腔？或是偏泉腔？大都缺乏明確的計量標準。今日因為社會語言學的發展，運用計量來判別、歸類，是一個可行的方向。這類研究在張素蓉、簡秀梅與洪惟仁合作的論文中，已有不少的討論。

4-2-2、區域性（成片方言）的比較研究的不足

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研究，大多牽就於行政區域，調查範圍不是一縣要不就是一鄉、鎮、市，這種調查研究，大多是傳統方言學式的研究，此類研究的優點，在於能夠窮究一地的方言特色。但是由於調查研究的範圍被行政區域所限，所以往往會忽略了此方言與臨近地區的相互關係，同時也無法真正釐清此一方言的分佈範圍。所以我們需要跳脫行政區域的限制，改以一個方言為研究範圍，這就是成片方言的研究。

臺灣地區成片方言的研究，與其他研究來比較相對上是較少的，詹伯慧（2002：13）指出：

臺灣的同道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對全島閩語的面貌無疑早就瞭如指掌，但是，所發表方言著述，亦多屬一市一縣的台灣閩語，尚未見有內容囊括全島閩語的成片閩語調查報告問世。

此言明確地點出臺灣現今閩南語方言研究的不足之處。但是經過這些年臺灣學者的努力，在成片的方言研究上已有不少傑出的研究出現。如：洪惟仁（2004）〈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洪惟仁、簡秀梅（2007）〈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

²³ 偏漳腔與偏泉腔的特色，洪惟仁（1992）頁72~77也有詳盡的論述。



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另外李仲民的博士論文（2009）《語言在時空的變異與變化——以臺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為例》則是專門討論臺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的學位論文。

但是在於臺灣全島的成片方言的研究報告，還是較為缺乏，僅洪惟仁的《台灣方言之旅》算是較為符合的報告。然而這已是 1992 年的作品，近來則未見有此類的研究。這是年輕學者仍須努力的一大方向。

4-2-3、後繼研究人員的缺乏

對於未來的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而言，後繼研究人員的缺乏是最大的隱憂。由上節所述，我們可看到，戰後在臺灣的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全力投入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其中研究成果最豐富的，首推洪惟仁、張屏生二位。洪惟仁先生致力於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調查研究，所以無論在宏觀、中觀、微觀的研究上，都獲得極大的成果。張屏生的研究興趣，在於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研究上，致力於發掘臺灣閩南語的各種變體。經過長時間的調查，累積相當可觀的調查點跟語料。這些語料成爲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重要的基礎材料，並且由於調查地點的累積，也足以繪製全臺的語言分佈圖。張屏生（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以及第一冊所附的臺灣語言分佈圖，正是他長期調研究的成果展現。

在臺灣近代的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上，洪惟仁先生一直是後學者的先行導師，甚至可以這麼說，臺灣的新生代從事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學者、學生，或多或少都會從洪老師處得到啓發。特別是其大作：《臺灣方言之旅》，幾乎可以說是 40 歲上下，欲從事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必閱的書籍，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²⁴。

隨著臺灣台文系所的成立，董忠司先生、洪惟仁先生指導了不少年輕的研究生，然而持續從事語言調查、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卻寥寥可數。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是一門需要花費大量人力、金錢與時間，並且需要長期累積、極爲辛苦的工作。這些條件往往使得想要投入此工作的年輕學生卻步，因此後繼研究人員的缺乏，是未來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最需重視的問題。

²⁴ 張屏生教授曾跟筆者說到：時至今日，無論走到那，手邊仍然會放著一本洪惟仁先生的《台灣方言之旅》以便隨時翻閱。



5、結論

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若由小川尚義（1907）〈臺灣言語分布圖〉算起已有百年的歷史。而本文僅能夠對臺灣戰後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的發展，做一概略性的回顧。

戰後的臺灣方言學的發展，從承繼大陸來臺學者的影響，臺灣的地理語言學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經由吳守禮、丁邦新、鍾露昇、顧百里、董忠司、洪惟仁諸位先生的努力，終於使得臺灣的地理語言學得到開展。尤其是近二十年來，臺灣的地理語言學的進步一日千里，這一方面是受到社會、政治環境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是前述諸位先生所培育的第二、三代研究人材的加入，讓臺灣的地理語言學得到全新的能量和動力。至此，臺灣的地理語言學也逐漸跳脫大陸傳統方言學的窠臼，走向注重共時研究，並且細緻化、跨學門化以及資訊化，獨具特色的發展方向。

凡是進行過語言調查研究的人都知道，語言調查研究是一條漫長又孤寂的道路，若非俱備堅強的毅力、過人的體力以及對這片土地的熱情，是難以持續下去的。所以本文除了推崇小川尚義先生在百年前，便能為臺灣地理語言學奠定優良的傳統外，同時也要向所有為臺灣語言調查研究奉獻心力的前輩們和目前正在進行語言調查研究者致上最高敬意。



參考文獻

- 吳守禮. 1954.《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臺灣省文獻會。
- 丁邦新. 1980.《臺灣語言源流》，臺灣學生書局。
- 丁邦新、楊秀芳.《臺北市志卷四社會志語言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李仲民. 1998.《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 2004.〈科技與語言調查〉，第一屆語言、文獻與調查學術研討會，新竹師範學院。
- . 2006.〈臺北縣三芝鄉地理方言研究〉，第六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 . 2009.《語言在時空的變異與變化——以臺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為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洪惟仁. 1992.《台灣方言之旅》，前衛出版社。
- . 2001.〈台灣的漢語共時方言學的發展〉，廈門 第七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 . 2002.〈臺灣的漢語方言地理學〉《方言地理學の課題》東京，明治書院。
- . 2003.《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論文。
- . 2004.〈高屏地區的語言分布〉，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 2009.〈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臺灣語文研究》，台北，台灣語文學會主編。
- 洪惟仁、簡秀梅. 2007.〈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洪惟仁、張素蓉. 2008.〈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載《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文鶴出版有限公司，p.13-43。
- 張屏生. 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1~4 冊），臺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 張屏生、李仲民. 2006.《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第六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 張素蓉. 2006.《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 曹志耘. 2006. 〈地理語言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中國方言學報第一期》,北京商務印書館。
- 游汝杰. 2000.《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 項夢冰. 2005.《漢語方言地理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詹伯慧. 2002. 〈從歷屆研討會看閩方言研究的當前課題〉,《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潘科元. 1997.《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露昇. 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國科會報告。
- 簡秀梅. 2006.《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顧百里. 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 龔煌城、姚榮松、洪惟仁. 1988.《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第一年期——臺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民國 77 年 5 月至 78 年七月。
- 賀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禮譯. 2003.《漢語方言地理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 真田信治等著,王素梅、彭國躍譯. 1992.2002.《社會語言學概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年初版,2002 年中譯本。
- 布龍菲爾德 (Leonard Bloomfield) 著,袁家驊等譯. 1933.2002.《語言論 (LANGUAGE)》。北京商務印書館。1933 年初版,2002 年中譯本。
-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著,高名凱譯. 1949.1980.《普通語言學教程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北京商務印書館。1949 年初版,1980 年中譯本。
- 羅朗·布洛東 (Roland Breton) 著,祖培、唐珍譯. 1995.2000.《語言地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三版,2000 年中譯本。
- J.K.Chambers and Peter Trudgill. 2002(1998).《Dialectology》.北京大學出版社。
J.K.Chambers and Peter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Peking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N. 1964.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Mouton.



The Prospection and Retrospection of Geolinguistic studies in Taiwan Postwar

Chung-Min LI

After Naoyoshi Ogawa laid a foundation, the research of Southern-Min dialect has been improved in Taiwan for development of hundred years. Especially in last decades, it has been improved quite a lot by obtaining excellent results, no matter on profundity and extent. However,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is the retrospection of Southern-min dialect research of postwar Taiwan and the analysis of tendency in future development.

Although Southern-Min dialect research of postwar Taiwan was affected greatly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Min dialect research of Taiwan is different from China by the diversity of science passing down and research purpose which made Southern-Min dialect research of Taiwan gain uniqueness. Overall, Southern-Min research in China based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Thus, it valued the records of each place and emphasized the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Also the purport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esides, it is limited by social circumstances, so the investigated areas are only countries, and take the sounds of city areas as standards. Therefore, it only presents the initial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each country can't be reveal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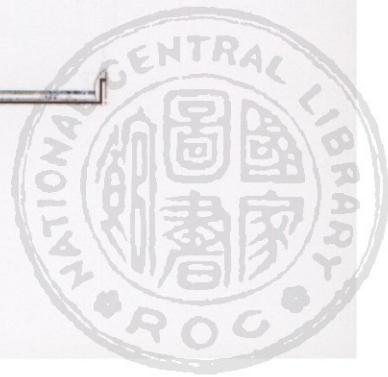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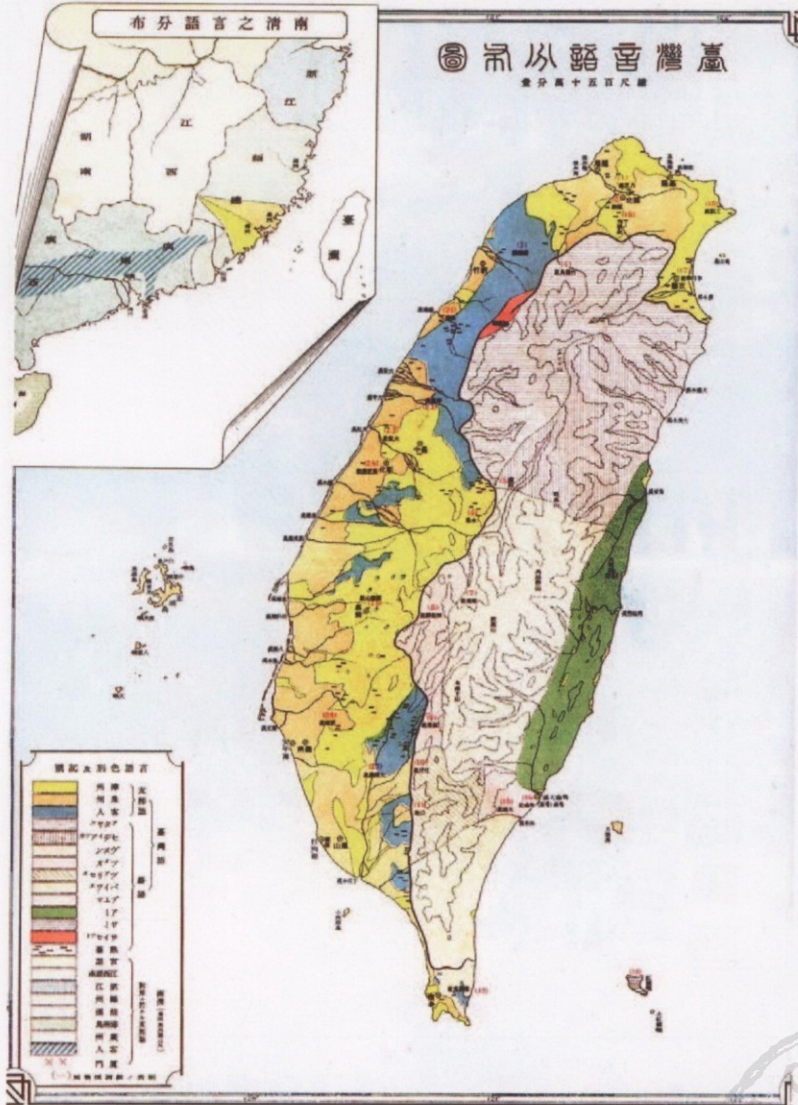
On the opposite, comparing Southern-Min research of China with Southern-Min research of Taiwan, Southern-Min dialect research in Taiwan is much more diverse and microscopic, and gained great results, no matter on 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or on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In addition, the investigated dialect areas are not only towns, but also villages. In recent years, the technique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has been combined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PS, and satellite photographs. And it has been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developed with computer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olinguistic research based on social linguistics also have gotten great achievement in Taiwan recently.

Key words: Geolinguistics, dialectology, Southern-Min dialect, linguistic Fieldwork,
language atlas.



附錄：【語言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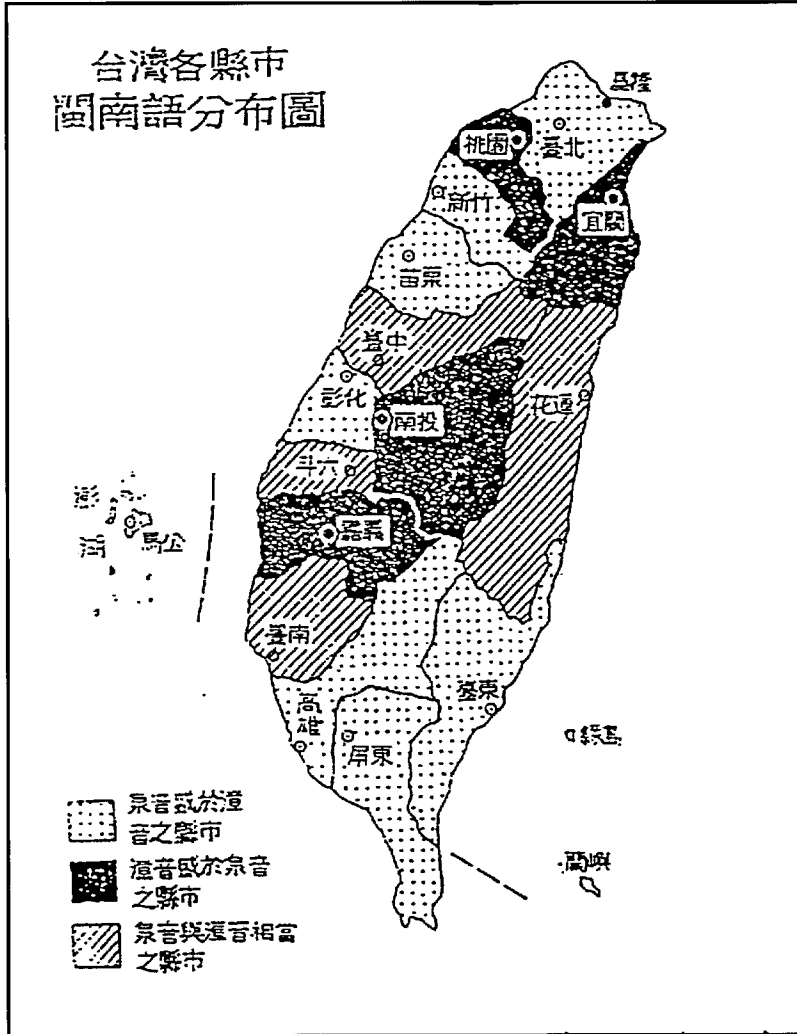
圖一、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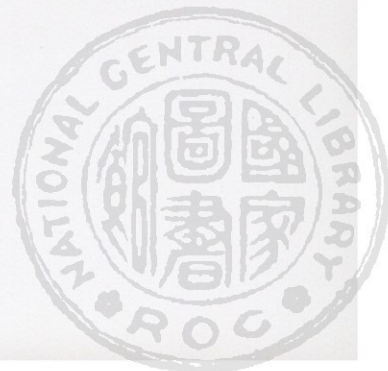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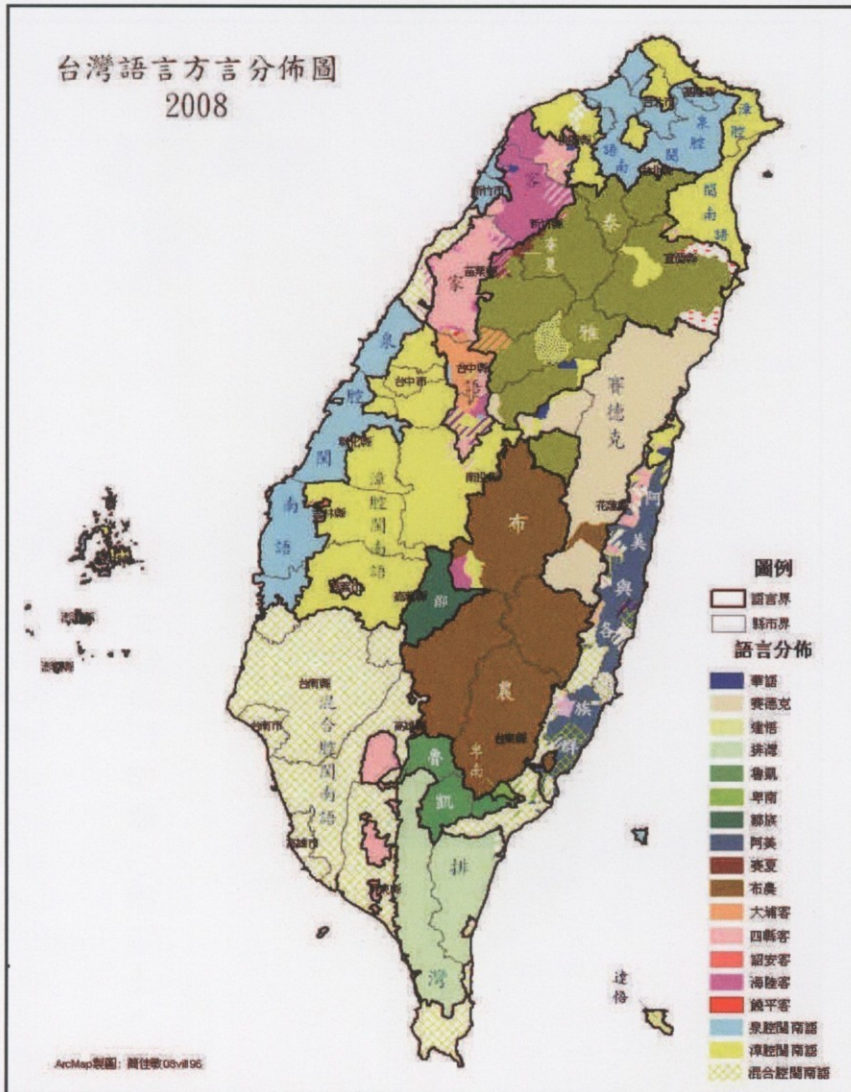
圖二、吳守禮（1954）「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
（暫缺）

圖三、鍾露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豬肉」
（暫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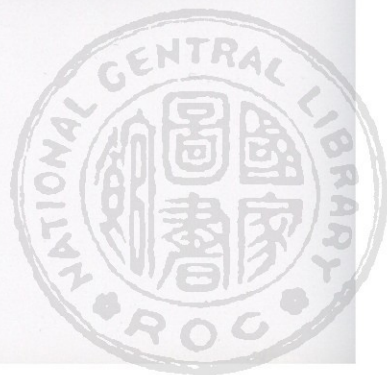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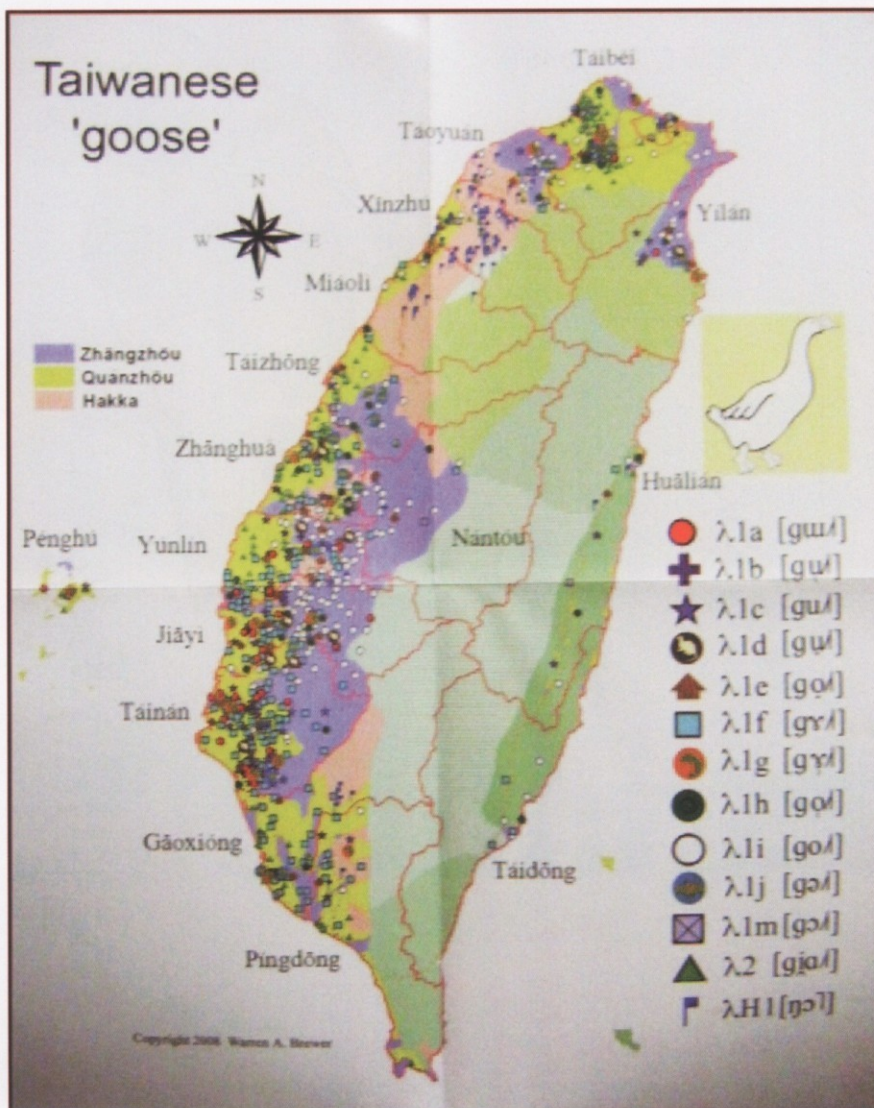
圖四、丁邦新（1980）《臺灣語言源流》「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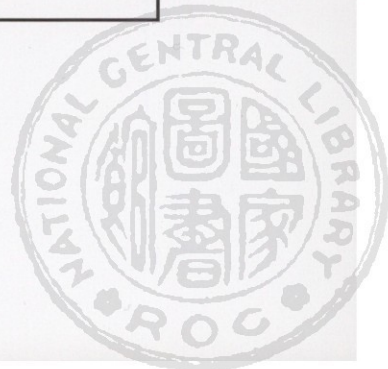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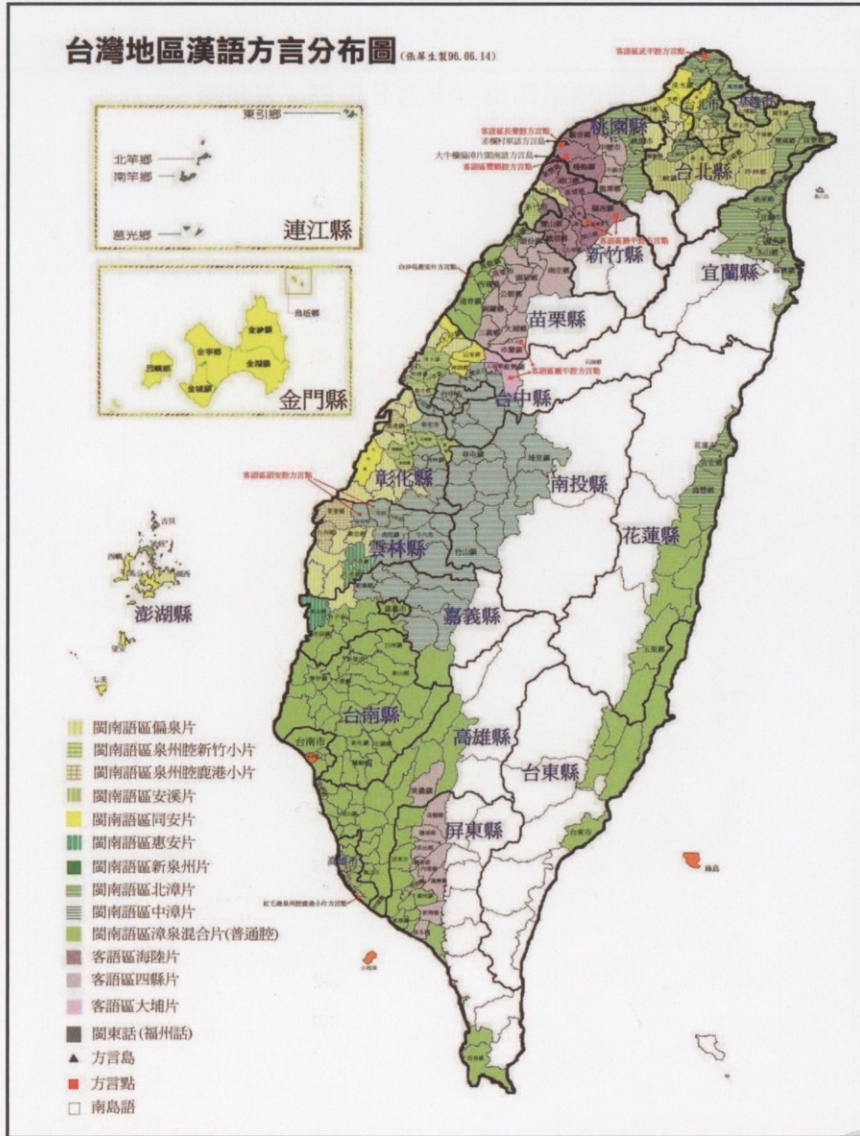
圖五、洪惟仁「臺灣語言方言分區圖」(2008)



圖六、卜溫仁（2009）《臺灣語言學圖集》——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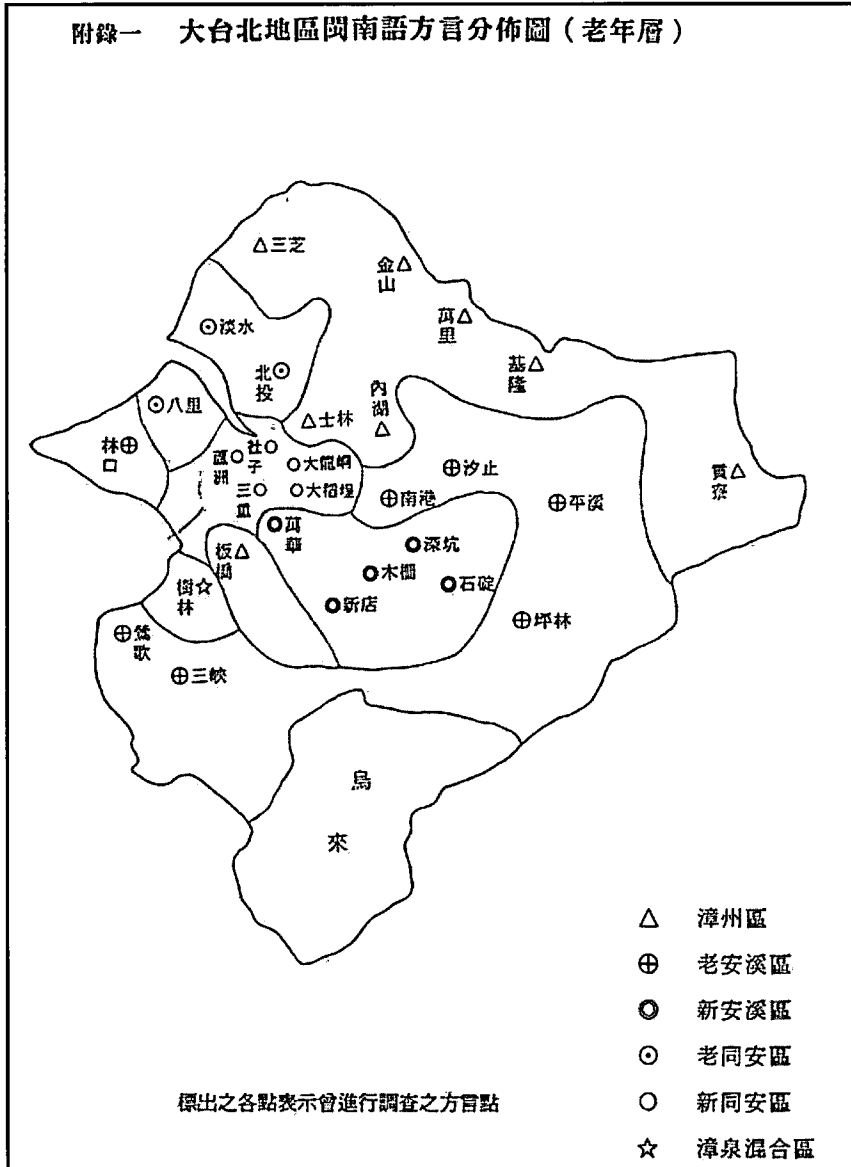


圖七、張屏生「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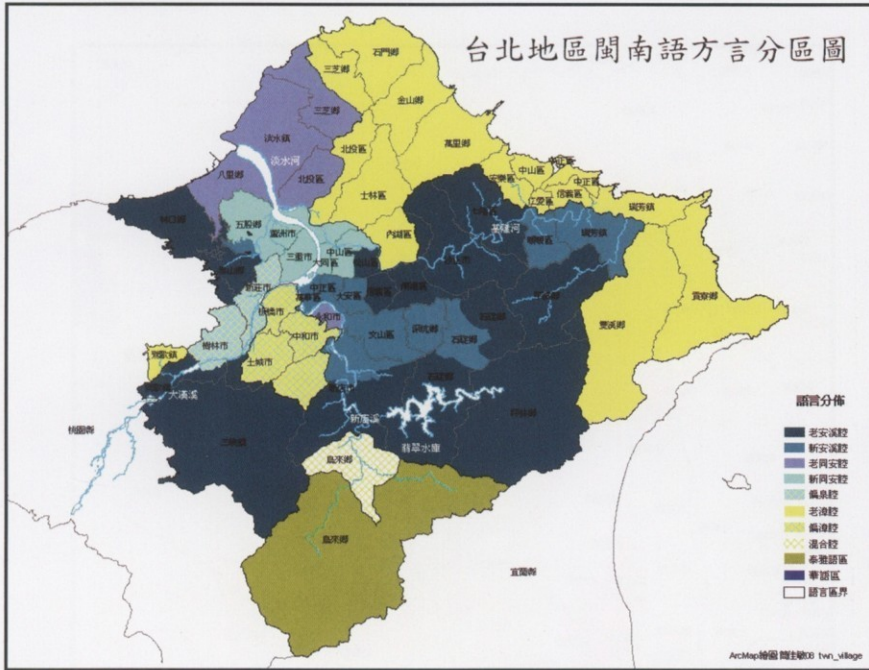


圖八、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澎湖方言綜合地圖」
(暫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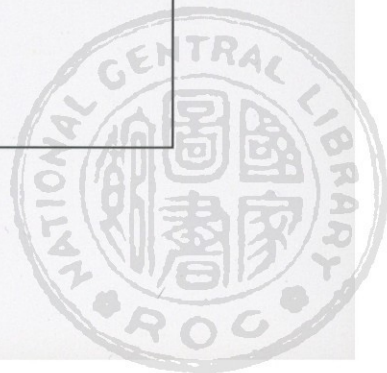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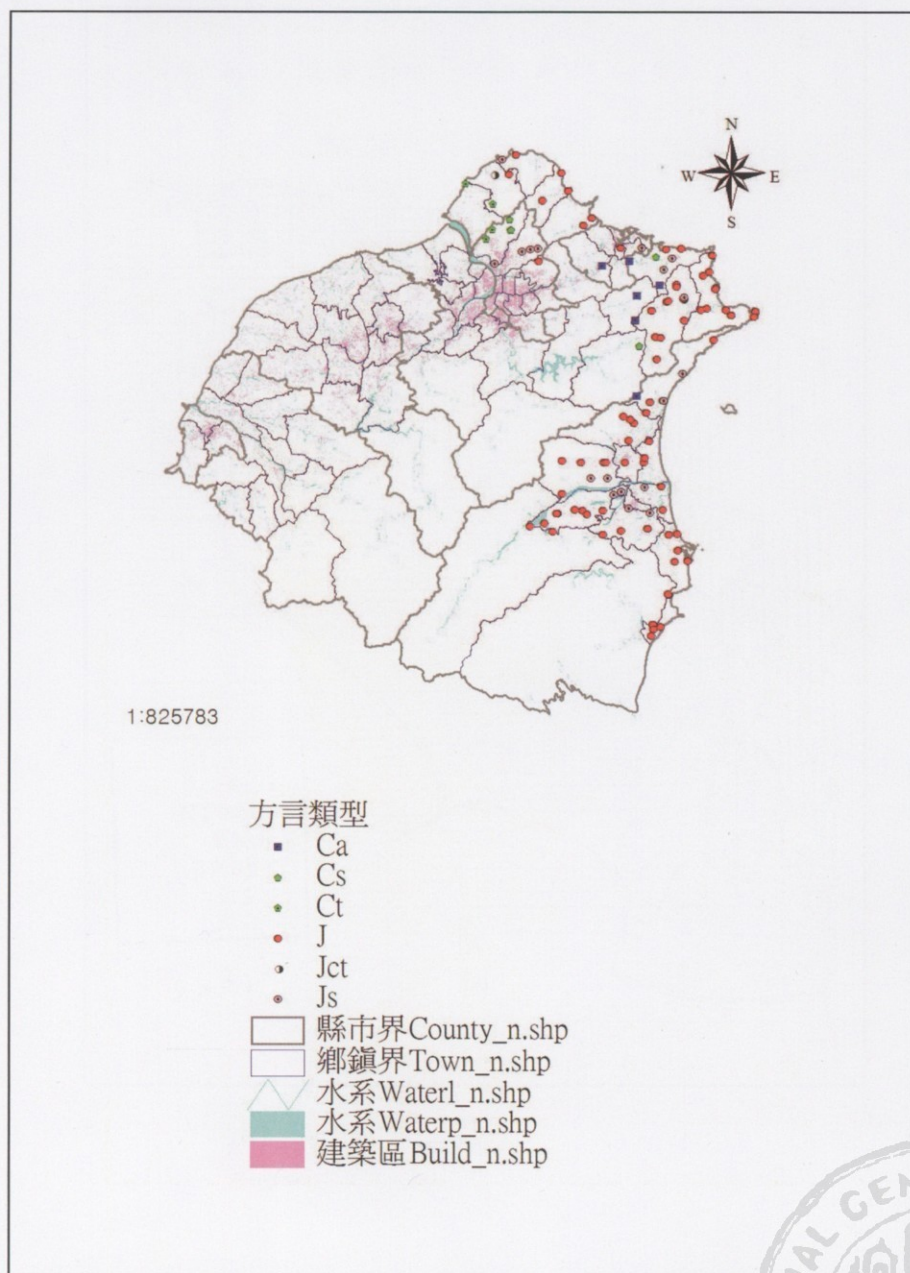
圖九、潘科元(1997)「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老年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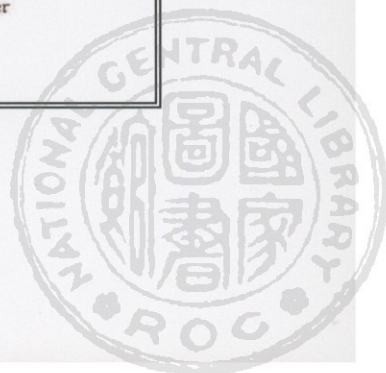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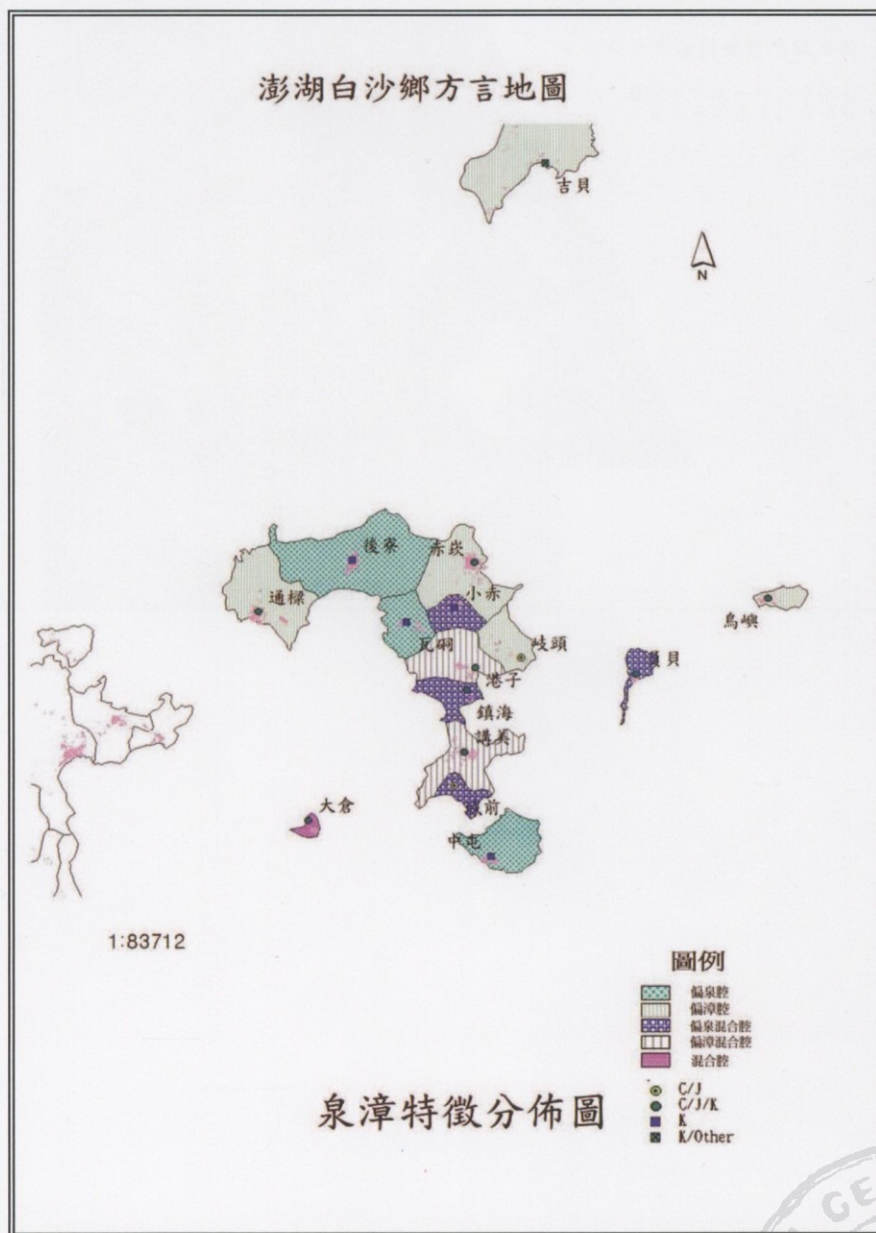
圖十、洪惟仁（2007）「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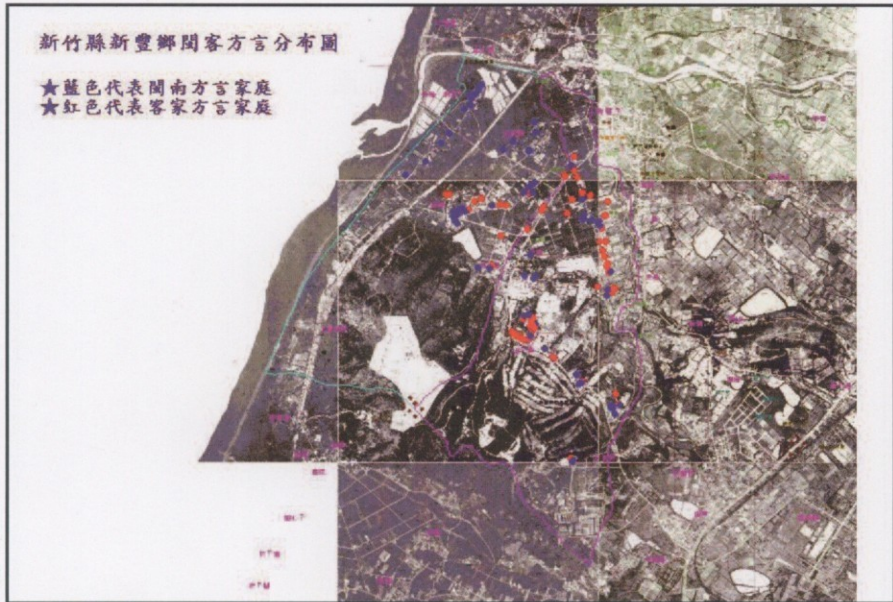
圖十二、李仲民「臺灣東北部泉、漳州音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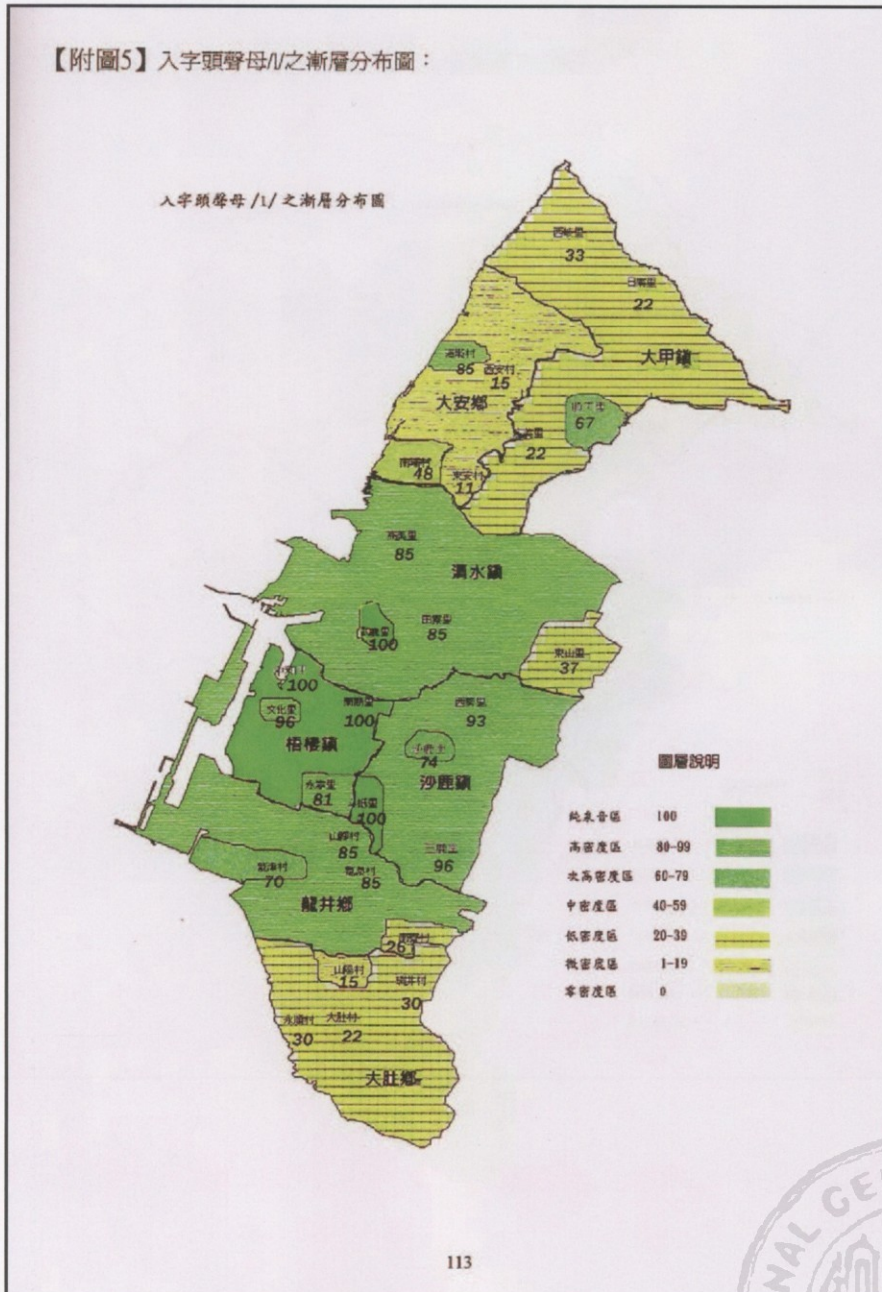
圖十四、張屏生、李仲民 (2006)「漳泉特徵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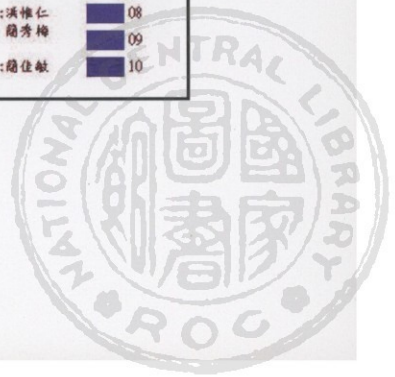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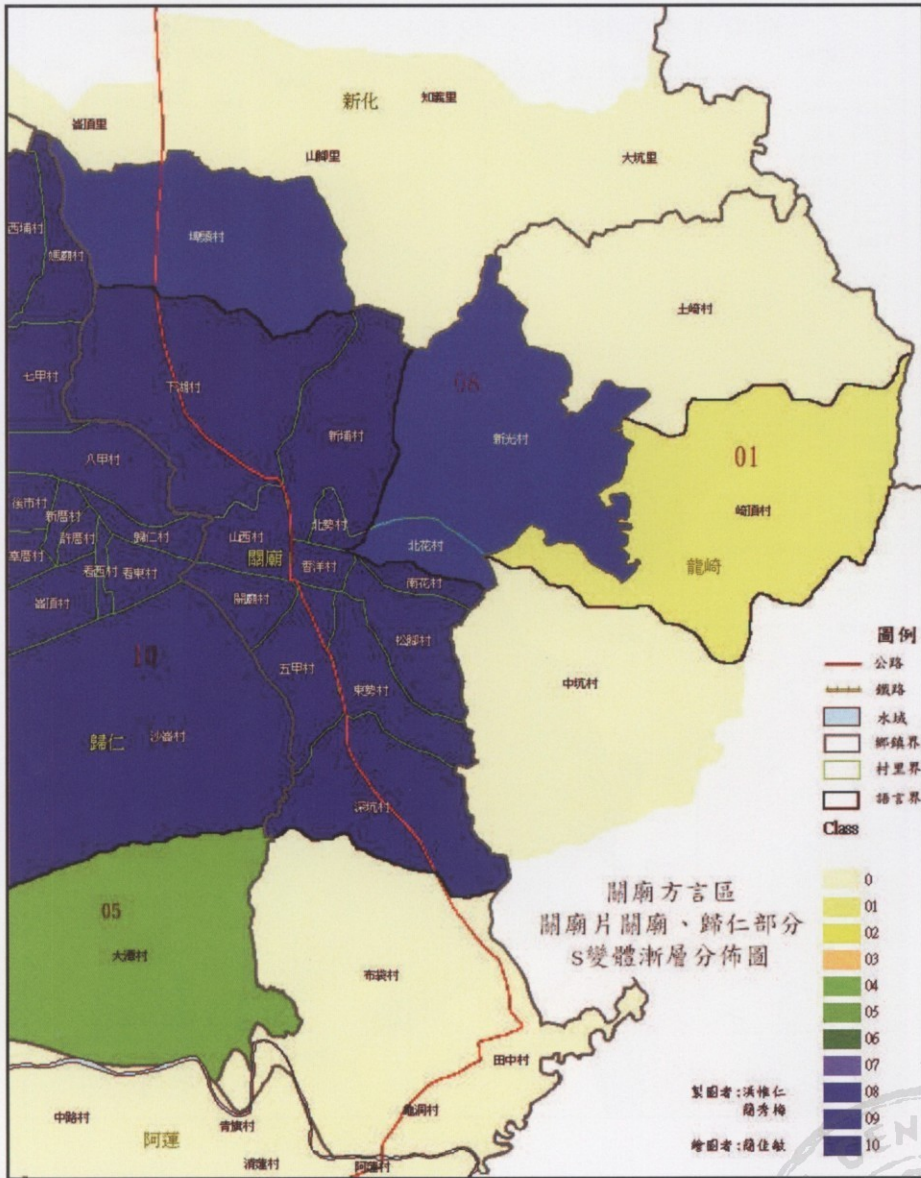
圖十五、鄭錦全（2003）「新竹縣新豐鄉閩客方言分布圖」



圖十六、張素蓉 (2006)《台中縣海縣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



圖十八-1、洪惟仁、簡秀梅 2008〈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



圖十八-3、洪惟仁、簡秀梅 2008〈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

